

中國文哲叢書

司馬相如集校注

〔西漢〕司馬相如撰
金國永校注



〔西漢〕司馬相如著
金國永校注

司馬相如集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109號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司馬相如集校注

〔西漢〕司馬相如 著

金 國 永 校 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長寧書屋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印刷十二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7.625 插頁 5 字數 216,000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0

ISBN · 7-5325-1494-3

1·757 精裝定價 7.90 元

前言

司馬相如字長卿，原名犬子，蜀郡成都（今成都市）人，生於漢文帝前元年（前一二九），卒於武帝元狩六年（前一二七）。他是著名的漢賦大師：既是修麗閎衍的漢大賦的奠基人，又是作楚聲的騷體賦的佼佼者。他的散文蒼勁沈雄，不失西漢文之特色。歷代論者言及西漢文章，或稱賈（誼）馬，或稱枚（乘）馬，或稱司馬遷相如，或稱揚（雄）馬，都離不開司馬相如，足見他在我國文學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

司馬相如身歷漢文帝、景帝及武帝前期，都是明主在朝，社會比較安定，國足民贍的盛世。尤其在他成年從事文學創作的時期，景帝已平定七國之亂，開始反擊匈奴入侵，內外又安；武帝繼立，以其雄材大略舉賢良，興太學，定曆數，協音律，北征南討，四夷臣服，文治武功之盛，足以使萬民爲之踊躍，志士爲之捐軀，詩人爲之頌歌。而當武帝於師旅之後繼之以奢侈，橫征暴斂，致「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漢書昭帝紀贊）之晚年，相如又已病逝於茂陵，長眠於地下了。處在這樣的歷史範圍之內，出現像

相如這樣頗多於諷的文學家，不正是特定時代所造就，也是特定時代所需要的嗎？

相如的家世，史無明文，但言文翁守蜀曾遣其受七經，其後以貲爲郎。漢制：以貲爲郎者必十萬以上，而富埒王侯之商賈子弟不得爲官，可證其家爲富有之士紳，他有一個相當優越的學習環境。這也是造就一代文豪的重要條件。

關於相如的青少年，史記有一段十分重要的話被班固篡改得面目全非而又被歷代史漢注家所誤訓，原文是：

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

文義再明白不過了。犬子是他父親爲他取的名，而不是注家們所說的字或愛稱。後來他自己才改名相如。問題出在爲什麼他父親因他「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名之曰犬子」。班固不理解，妄刪「故其親」之曰「五字，把前後的因果關係刪掉了，對正確了解相如青少年時期的情況設下了障礙。

現在先解釋一下以犬子爲名的真正含義。國語越語上：「生男子，二盞酒，一犬。」注：「犬，陽畜，知擇人。」可見三國時代的韋昭，都還懂得勾踐所以用犬來激勵全國男兒，是希望他們成人後都要作個大丈夫，在他的領導下振興祖國，滅吳雪恥。那麼，在西漢初年的相如之親，見相如努力習文練武，「故名之曰犬子」，以鼓勵他日後成長爲知擇主而事、建功立業的大丈夫不是很自然的麼？但是，相如並不滿足於作一個一般建功立業的大丈夫，而立志作一個像蘭相如那樣以其大智大勇，建立特殊功勳的

奇男子，所以「更名相如」，不也是很自然的麼？關於這一點，華陽國志所載相如初發長安時題市觀「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之文，可以互相印證：相如青少年時代頗有大志，又自視甚高。

但是，相如入仕後的進退行止，頗與其少志不倖。史記本傳說他初入仕是「以貨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此職雖不顯而榮，名將李廣和後來曾致丞相高位的李蔡幾乎與相如同時入選。倘相如當時能像他們一樣悉心盡職，則平步青雲，踐其少志是指日可待的。這時的相如按所有史料推算只不過而立之年，他卻像歷史上一些懷寶不遇，困頓仕途多年的人一樣棄官而去，客游梁數年。景帝中元六年（前一四四），梁孝王卒，與相如同遊的辭賦之士鄒陽、枚乘、莊忌夫子等人皆樹倒猢猻散，相如也銷聲返歸故里。這就足以說明，未至壯年的相如，並不汲汲於功名利祿。

尤有甚者。史記本傳說：「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這就是說，十萬以上家財，已被他揮霍耗盡了。他只有去投靠素與相善的臨邛令王吉。「臨邛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尙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既有求於人，而又慢辱相加。臨邛富人卓王孫因其爲縣令貴客，設宴相邀，親自謁請，「長卿謝病不能往」，以示鄙夷，但當王吉再次往迎，「相如不得已，彊往」，又琴挑其女。其後爲生活所迫，竟不顧已曾爲皇帝侍從、妻亦乃巨富之女的身份，夫婦酤酒於市，自著賤者之服，與奴婢爲伍而不以爲恥。所有這些，都說明三十多歲的相如對富貴榮華的蔑視態度和對禮法世俗的叛逆精神，與他少年時之醉心於赤車駟馬對照，判若兩人。

何以相如有此劇變？他那傲世狂放之資質不能爲社會所容自然可以作爲一個理由。但他輕易辭官，棄功名如敝屣者又作何解釋？史記本傳所言「景帝不好辭賦」之理由不够充分，恐怕只有從他入仕後目睹景帝刻薄寡恩，以諉過或猜忌忠臣良將之鼂錯、周亞夫等人去尋找其蛛絲馬迹。同時，還應看到相如之所棄者乃榮華富貴，而並沒有泯滅他欲有所作爲，建功立業的雄心。這是從他在武帝時應召赴京再度爲郎可以得到證明的。

據通鑑系年，相如再度赴京是建元三年（前一三八）左右，相如已屆不惑之年，他仍然寫了上林賦，盡情謳歌天子苑囿之盛。這只能從武帝即位後即延攬賢俊，勵精圖治，使他受到鼓舞，煥發青春，來作出合理的說明。

可是，相如的這種熱情並沒有保持多久。在元光五年至元朔元年（前一三〇——一二八）他兩次出使返京後，因被人控告使時受賄而失官年餘，遭此挫折，自然要促使他更加冷眼看世界。同時在朝日久，也不可能不看到武帝雖雄材大略，卻也驕恣信讒；朝臣雖人材濟濟，卻也在互相傾軋的嚴酷現實。本傳說：「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主要原因在此。所以，他除了曾以中郎將（一說郎中將）出使外，在朝官止於郎和陵園令等閑散卑職。

漢書嚴助傳曾綜論過武帝即位之初所薦拔的賢俊之士：「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婁（屢）舉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

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誦。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舉、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舉不根持論，上頗俳優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阿意順旨而竊丞相高位的公孫弘，「上頗俳優之」的朔、舉輩無足論。至於嚴助官至中大夫，吾丘壽王至光祿大夫，都躋身公卿之列，確是見任用了的。豈止他們，其他先後被詔的朱買臣位列九卿，主父偃一歲四遷官職，但都和嚴助等一樣未逃脫或族或誅的命運。這些人都以才智卓異而得遇，亦以邀功倖進而被誅。比起他們來，相如雖得天子親幸，常侍左右，但卻始終淡泊自守，不爲利祿所動，不是要清高和明智得多嗎？

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說：「武帝時文人，賦莫若司馬相如，文莫若司馬遷，而一則寂寥，一則被刑。蓋雄于文者，常桀驁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可以作爲上引嚴助傳的注腳。

嵇康高士傳贊更對相如充滿仰慕之情，他說：「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但在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裏，男女之防、尊卑之別等倫理觀念愈演愈烈，相如之戲侮故交，琴挑文君，自詡都麗，甘伍傭保，自不免被衛道者們目爲文人輕薄，爲自作賤；而其常侍天子左右卻稱病閑居，沒有冒斧鉞以犯顏直諫，也難逃希世苟合之譏。所以，歷代對相如之文雖交口贊譽，而對其爲人則毀譽參半。顏氏家訓之列相如於「文人多陷輕薄」之林，章樵古文苑注之據西京雜記詆相如「隳行喪軀」，朱熹楚辭後語之所謂「知其阿意取容之可賤」，就是詆毀聲中的強音。

二

相如既然不汲汲於生前榮寵，對身後留名就看得更加淡薄。本傳記其妻所言：「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說明他從不保存自己的著作，早已散失殆盡了。今所知者，史記本傳除錄引文賦共八篇外，還說有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等篇。平陵侯蘇建是蘇武的父親，多次隨衛青擊匈奴，官至右將軍，後爲代郡太守，也身當抗禦匈奴前綫，相如所遺之書可能是有關邊事的吧？倘是，將又是一份寶貴的史料。漢書藝文志著錄相如有賦二十九篇，小學凡將一篇，又禮樂志說他曾作詩以配樂。崔豹古今注也說相如曾作釣竿詩，遂傳爲樂曲。此外，還有西京雜記所引答盛驥問作賦、文選魏都賦、劉逵注引之黎賦、北堂書鈔著錄之魚鮪賦等。就連這些知道篇名或篇目的詩、文、賦可能也早已失傳或僅留殘句，故隋書經籍志著錄僅文集一卷，既然只有一卷，所輯當不會超出本傳和文選、玉臺新詠等所錄多遠，其不爲世所重而亡佚是必然的了。

就現存相如文賦看，除了純屬男女戀情之琴歌和報卓文君書外，其餘各篇大抵可根據寫作時間分爲前後兩期，來探索其思想內容、藝術特色及文章風格的變化。

屬於相如前期作品的是他最爲世人所推崇的二賦二文。二賦即作於景武之交的子虛賦和上林賦，是兩漢各辭家共同奉爲典範，並爭相模仿的漢大賦。思想內容主要是誇耀謳歌山川之宏偉、園囿之壯

麗、物產之豐饒和畋獵之盛況，最後歸結於行聖王之政，正君臣之禮，興道遷義，體恤民艱，諸侯不當僭越，天子也不宜奢侈，有着明顯模仿宋玉高唐賦的痕迹。結構上也和文選宋玉登徒子好色賦一樣用虛擬人物相互問答的形式。由於相如二賦的作成是在大一統的漢代國泰民安的極盛時期，遠非宋玉所處偏居一隅、君昏國弱的楚國季世之比，故其鋪張宏麗，馳騁想象皆遠遠過之。但在藝術技巧上，由於相如賦過分排比名物，堆砌辭藻，爲使文理條暢，難免按層次迭進，平鋪直敘，給人以遲緩呆滯之感，而不及宋玉賦之宛轉悠揚。雖有此病，它們卻能以其規模之恢宏、想象之豐富，輔之以細節處之刻意描摹，絲絲入扣，達到雄渾自然，雖乏波瀾而感壯闊，雖屬虛構而感逼真的藝術效果，很有感染力。故武帝讀了恨不得與作者同時，李白讀了由羨慕雲夢景色而隱居安陸，揚雄歎爲神化之所至，張溥譽以有得於內之賦心，千載知音皆爲之傾倒。魯迅 漢文學史綱要所論相如賦「制作雖甚遲緩，而不師故轍，自擅妙才，廣博宏麗，卓絕漢代」，也是指的這兩篇。

二文是指相如兩度出使所寫的喻巴蜀父老檄和難蜀父老文。文心雕龍分體屬於檄移，劉勰說：「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相如之難蜀老，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所謂「骨」，就是唐宋古文運動中標舉的漢魏風骨，也就是充實而健康的思想內容，相如二文當之無愧。其時相如返朝不久，功業之心未泯，積極擁護武帝內興禮義、外攘四夷的政策，故二文着意宣揚大漢之聖德和軍威，闡明武帝開邊是非常之人建非常之功，是拯民於沈溺之急務，創業垂統之宏業，既爲輯安中國所必須，

也是四夷舉首企踵之有望。兩文又因所諷對象之不同而各有側重，但皆雄辯滔滔，氣勢磅礴。所持論點又皆符合歷史發展的需要和國家民族的利益，義正辭嚴，令人折服。其中且不乏金聲玉振、發人深省之警句。

所謂後期作品，是指相如出使返京失官後，包括他那頗具超逸之氣的大人賦，給人以低個局促之感的哀二世賦和諫獵書等，再也看不到他前期作品中那種氣象恢宏的漢大賦和揮灑自如的散文了，而代之以作楚聲的抒情小製和文辭典雅的陳情風諫。把他前後兩期的文賦加以比較，不難看出他的思想和文學修養似乎均更加成熟，但由於他已喪失了謳歌盛世的熱情，自然再也唱不出激勵人心的頌歌。

代表相如晚期新的風格和藝術造詣的，當數那首全作楚聲的長門賦。此賦與大人賦之露骨模仿楚辭遠遊不同，格調很近楚辭離騷、山鬼等屈子之作，而又無模擬之迹。它描寫一個居於深宮永巷之中的棄婦的愁悶幽思，緣情託物，委婉含蓄，纏綿悱惻，堪稱抒情小賦的極品，對後世閨情、宮怨一類題材的歌詩影響頗大。由於此賦本傳未錄，輯於文選，有序，稱為陳皇后罷居長門宮時請相如代作以向武帝陳情，武帝讀後感悟，陳皇后復得親幸。所言不經，遂成疑點。南齊書陸厥傳錄厥與沈約書：「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只能說明前哲爲文，前期後期風格或不盡統一，未可疑及二賦是否出於相如一人之手。這種情形，僅與沈約書所列舉就不只相如一人。顧炎武的日知錄和何義門的讀書紀則直指

「長門賦乃廢品。其實以美人自喻或別喻賢人，屈子已爲倡首；至於古人爲文，後人命題作序，也是古之常例。以這些理由判長門賦非相如作未免過於武斷。朱熹貶斥相如不遺餘力，唯獨對此文說了幾句公允而有見地的話，他在楚辭後語中說：「此文古妙，最近楚辭。或者相如以后（陳皇后）得罪，自爲文以諷，非后求之。不知蘇轍何從實此云。」說此賦是相如一度失官後之「自爲文」，的是灼見。只是細審文義，原是相如自展情懷，自舒憤懣之作，硬加「諷」字，就失之迂腐。

相如後期的另一篇佳什是美人賦，寫作的時間和背景當與長門賦大抵相同。此賦之內容和結構均仿宋玉登徒子好色賦，用寓言形式剖析君主信讒的可悲和自身的清白，這裏借用朱熹評長門賦「自爲文以諷」的話到是恰當的。此賦在立意、設境等方面都比宋玉賦高出一籌，且筆意輕靈，字句妍秀，在漢賦中獨標一格。

最後談一下相如的絕筆封禪文。文選班固典引說：「司馬相如誇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言封禪事，忠臣効也。」他對相如的文和行幾乎全面否定，當然是很迂腐的。但他肯定封禪文是「忠臣効」，說明他畢竟是比較客觀的史學家，沒有因人廢文。劉勰的文學觀比班固通達得多，進步得多，對相如的文賦幾乎是全面肯定的，對封禪文除贊成班固的觀點外，又從文體創新方面給了很高評價。他在文心雕龍封禪中說：「觀相如封禪，蔚爲唱首。爾其表權輿，……贊之以介丘。絕筆茲文，固維新之作也。」但是，當他們把此賦和揚雄的仿作劇秦美新加以對比時，得出了頗爲皮相

的結論。班固說：「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劉勰說：「封禪靡而不典，劇秦典而不實。」何謂「不典」？是說封禪文沒有像書堯典、舜典那樣直述聖王功德，而只羅列符瑞。何謂「靡」？是說它不僅大量堆砌鋪寫符瑞，而且加以美化、神化。其實，封禪文結尾強調「聖王之德，兢兢翼翼」，與必慮衰，安必思危」，說明天命不可違，當帝王的必須敬天順德。聯繫武帝當時的驕恣放縱，窮奢極欲，隨意誅戮臣僚，惑於尊奉方士，則此文之「靡而不典」，用心又何其良苦！語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亡，其言也善。」封禪文足以當之。至於此文逐奇險而欠流暢，求典雅而病呆滯，在藝術技巧上成爲失敗之作，就只能從病入膏肓的老人，有氣無力，筆不從心來給他開脫了。

三

鑑於兩千多年來，對相如文賦的批評，多是仁智並見，抑揚任聲，許多贊議之詞，散見於浩繁的篇帙。對於那些沒有專攻過相如的讀者，很容易偶然檢得一隅之見，以偏概全，不利於比較客觀地理解相如文賦，故在此就幾個影響頗大的論點作簡略的剖析。

一是所謂「虛辭濫說」問題，見史記相如本傳，可見其源遠流長。所謂「虛辭」，是本無其事而假定其有，如大人賦之駕龍神遊，美人賦之對梁王問。所謂「濫說」，是雖有其事，但加以誇張矯飾，在相如文賦中比比皆是。所以歷代抨擊濫說，莫不首列相如。左思三都賦序說：「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

「熟，……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北方的京畿怎能生長南方的植物呢？所以他批評說：「於辭則易爲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修言無驗，雖麗非經。」貌似有理，其實是不懂文學規律，故王觀國學林駁之云：「盧橘夏熟，正所以見上林之富麗，四海之嘉木珍果莫不移植其中。」當然不是上林賦之一病。劉勰比左思通達得多，他在文心雕龍夸飾中不僅指出只要有文學，就必然有誇張的修辭手法；而且提出適當的誇張是美的概念。但他論及相如就不免有微詞了：「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溢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苑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鷦鷯（鷦鷯）俱獲。」所舉「詭溢」兩例，一所以喻離宮別館之高大，一所以喻天子畋獵捕獲之衆，正常的讀者只能驚歎相如想象的豐富，而很少有人會當真相信上林苑內出現過星虹入軒，神鳥入網的奇景壯觀的。如果這也算「詭溢」，按劉勰的要求「酌詩書之曠旨，剪揚馬之甚泰」，即把子虛、上林中最形象生動的語言刪去，還成其爲卓絕漢代、數朝宗師的偉大歌詩嗎？而且按劉勰的標準，詩書中也未必沒有「詭溢」，如書舜典所言舜一歲之中巡狩四嶽，書泰誓中言「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其誇飾程度，和相如賦又有多大區別？不過這是聖人所立的經典，劉勰不敢懷疑罷了。

二是所謂「勸百而諷一」的問題。此說源於揚雄。雄初好辭賦，每作賦，常擬相如爲式。後來認識上起了變化，漢書揚雄本傳說：「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也，……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繆繆有凌雲之志。繆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於是輟不復爲。」這就是揚雄把賦說成「壯

宋不爲」的「雕蟲小技」的理論根據，迄今仍被一些論者視爲至理而加以引用，足見其影響之深遠。其實這個理論是站不住腳的。詩有六義，「風」僅居其一，詩三百篇既有頌歌，也有不少情愛之作，楚辭除了離騷、九章，還有九歌、天問、遠遊，何嘗篇篇皆風？爲什麼賦必須「將以風也」？子虛、上林的成賦時間及其寫作背景雖衆說紛紜，莫衷一是，要之不出相如入武帝朝之初或稍前，其時國家安定，「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漢書食貨志），可見相如在賦中用大量篇幅極靡麗之辭以謳歌誇耀大漢文物之盛，不過是頌其所當頌，且不說結尾處的「文以明道」，單就是這些對大漢盛世的頌歌，二千年來也曾起到增加人民對祖國歷史的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的作用，已不能視爲雕蟲小技了，更不用說它們對中國文化發展所作的貢獻，決不是揚雄那些代聖人立言的法言、太玄等所可比擬的。至於大人賦，雖非相如賦之上乘，但嵇康譽爲「超然莫尙」，劉勰許以「氣號凌雲，蔚爲辭宗」（文心雕龍風骨），給予相當高的評價，是因爲相如之所風，乃「帝王之德意」（史記相如本傳），也就是秦皇、漢武求仙以長享帝王生活的妄想，而不是揚雄所說的「止」其神仙之所好。正因爲如此，大人賦着力於遠塵絕俗，超然高舉，使武帝讀後「飄飄有凌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間意」，並於此後誅殺妄誕不經的方士女巫，又在相如死後數年登泰山封禪，則相如之所望於武帝者均基本實現，使史遷許以「與詩之風諫何異」，則揚雄之所謂「賦勸而不止」，並不盡是。當然，揚雄作爲季世易代之臣僚，不能效屈子之沈江，子魚之尸諫，能悔其飾季世爲太平、頌庸主以聖德的少作，輟不復爲，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但他終未能痛自反省，

却責相如於地下，就不免令人遺憾了。

三是「能諂而不能諒」的問題。此說出於朱熹楚辭後語：「相如之文能侈而不能約，能諂而不能諒。其上林、子虛之作，……然亦終歸於諛也。特此二篇（長門賦、哀二世賦）爲有諷諫之意，……亦足以知其阿意取容之可賤也。不然，豈其將死而猶以封禪爲言哉！」這個朱夫子死抱着他那一套「存天理，滅人欲」的世界觀，標舉「詩言志」，鄙夷「詩貴情」，貶斥相如賦是必然的。但他把一個官止于郎，而又未嘗肯與國家公卿之事，「不慕官爵」、「越禮自放」的人強加上「諂」、「諛」、「阿意取容」等等惡言穢語，也未免太武斷和霸道了。僅就封禪而論，作爲國家盛典，它之產生是適應着秦漢之際天下一統，各民族融合的需要，故當時不管賢不肖，皆寄望於封禪之盛舉。司馬遷不僅也寫了封禪書，而且說過他父親因未得隨駕封禪，執其手泣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因而「發憤且卒」（史記太史公自序）。按朱熹的說法推論，司馬遷父子也可納入「阿意取容」之儔而有過於相如了。章學誠文史通義文德有言：

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遽論其文也。身之所處，固有榮辱隱顯，屈伸憂樂之不齊，而言之有所爲而言者，雖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謂，況生千古以後乎！

樂羣之貶相如，便是生千載以後，不知相如之世及其身處，而又自以爲代文武周孔立言，妄充解人之

例了。

四

本書以明末婁東張氏刊本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司馬文園集（現藏南充師範學院圖書館）為底本，以明萬曆間新安汪士賢校司馬長卿集（簡稱汪校本，現藏四川省圖書館）參校。其他參校各書：史記、漢書為中華書局標點本，文選為中華書局影印之胡刻本，楚辭後語為黎庶昌景元刊本，古文苑為叢書集成影印之守山閣叢書本，藝文類聚為汪紹楹整理校訂之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玉臺新詠為穆克宏校點之中華書局本。

本書所收文章、篇目及編排順序皆一仍張氏刊本之舊，其中對作者歸屬爭議較大者，於前言及該篇題解中略加說明。張氏刊本所遺之答盛舉問作賦及他殘句，輯為附錄之一，加標點，並注明錄自何書。史記本傳張氏刊本取其「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以後文字為附錄，今仍其舊，作為附錄之二。張氏刊本題辭論相如文頗精到，有重要參考價值，錄以為附錄之三。至於漢書於本傳以外（如禮樂志、嚴助傳）及其他史籍（如三國志、華陽國志）有關相如行迹之記述，凡有重要參考價值者，本書前言、各篇題解及自敘傳釋文皆分別引用，不再臚列；其他筆記小說（如西京雜記）雖有相如行迹之記述而未必可以徵實者亦皆不錄。